



□本报记者 杜晓辉

敬请读者关注。
26日起,连续三日连版刊出该文,剧笑渐不闻声渐悄》。本报从资料,采写完成了这篇《巴渠河川查阅了大量与巴渠河川剧相关的河川剧结下不解情缘的当事人,月,先后走访了二十余位和巴渠仍在。本报记者杜晓辉历时三有一种情怀能直抵人内心的震撼前万人空巷的时光不复再来,但和重新振兴的可能。纵然数十年巴渠河川剧还有没有拯救的价值化的优胜劣汰?处于消亡边缘的特完善,还是艺术形式选择多样曲的必然衰落?是保护机制的上的局限,还是大环境下传统戏到底是不是艺术创作和传播方式度尴尬之中。

们的视野,陷入生存与传承的深渊川剧,如今几乎完全淡出了我丽之花散发出特有魅力的巴渠的这片文化土壤里曾经绽放出绚时,到如今的后继乏人。在达州的门可罗雀,从曾经的红极一时的门可罗雀,从曾经的红极一

旧习俗

巴渠河川剧经历年深岁久的发展,应市场需求逐渐形成一些旧的演出习俗。200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巴渠川剧史》,由被誉为“剧坛全才”的已故川剧花脸演员何光表撰写。书中提到,巴渠河川剧过去的演出习俗大致有:大贺戏、寿诞戏、神诞寿戏、踩台戏、迷信戏、堂会戏、点戏、打闹台、跳加官、登场、罚戏、挂红放炮、院坝戏。

打闹台又名打头牌,一般是在演出前为等候观众或地方头面人物进行的演奏。其过程大体是观众入剧场时,由二鼓匠(即打堂鼓者)擂击二鼓,之后乐队成员合奏“三吹三打”。“三吹”即锣鼓之中插入的三支喷呐曲牌。第一支往往是以《汉中山》。曲牌吹毕,又接着打锣鼓。锣鼓打一阵后,又吹第二次曲牌。如是三次,既谓之“三吹三打”,其吹打时间长短,以打杂师(管事者)招呼“开戏了”为止。还有一种打闹台的方式,不用喷呐,只用打击乐器演奏若干串在一起的锣鼓牌子,其作用与“三吹三打”一样,为的是等候观众或头面人物。

罚戏,顾名思义惩罚,一般是传统表演艺术或剧情违背了常规(包括演出事故)就要受罚。主要是罚戏班或出差错的演员重演或重点一台戏。罚戏是不给钱的,因此无论演员或戏班,演出时都马虎不得。院坝戏,每逢天旱求雨或婚丧嫁娶,要请戏班唱戏。也有人为新告神灵、求财求子,请戏班唱戏,谓之“还愿戏”。这些戏一般在“万年台”或院坝中演,因而被概之“院坝戏”。

川戏班

相传清末清初,渠河一带普建戏楼,但当时依靠戏曲表演营生何艺人得不到社会尊重,被鄙视为“下九流”。如果戏曲艺人参加袍哥会不能进“仁”、“义”两堂,出席酒宴不能坐上席,特别是唱旦角的女艺人,更是朋友羞与为伍,族人不准其进祠堂,死后不能入祖坟,因此各地官方史志不记载“戏班”的事。而据现在能查到的文字资料是在清道光元年(1821)以后,才有了各地自办或集资办戏班演唱唱戏的记载。到光绪、民国时期,各县城或场镇纷纷创办戏班,对于戏班的记载也就逐渐多了。

据《巴渠川剧史》,清道光年间(1821—1850),川戏在渠江上游巴河沿岸商贸繁荣的白衣、江口、坦溪、兰草、渐岸等场镇(均隶属现在的巴中市平昌县)普遍流传。同治二年(1863)通江县草坝场有兴泰班演出(隶属现在巴中市)。同治十年(1871),万源县大竹河街上兴泰班演出(隶属现在巴中市)。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江县城隍庙改修结束,川东有名的“洞翠班”到此唱踩台戏。民国九年(1920),“全龄科班”在渠县城演出。民国元年(1912),“全胜科班”在达县城郑家祠堂开戏园演出。同年,宣化县“向茂春戏班”在县城和南坝场一带演出。民国十三年(1924),范先吉在大竹县城创办“竹阳剧社”(戏班)等,这些是渠河

沿岸各县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川剧班社中的一部分。后来,有的县多达十几个戏班。

打玩友

渠河两岸的人喜爱川剧,闲暇三五成群交流学唱川剧过戏瘾,久而久之这种自娱自乐方式被俗称“打玩友”,延续至今。好打玩友者中不乏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如1933年12月至1938年10月,川军21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两次带着玩友班入驻达县城。范绍增译名范哈(傻)儿,嗜好川剧,爱打玩友,还经常到茶馆里和玩友一起打围鼓。奉命调离达县时,范绍增的玩友班就地解散,但他离开前给每个玩友派发50块银元,以作生活之用。

相比范绍增,国民党陆军163师师长陈兰亭的戏瘾更大,他的师部常年养有一个玩友班子,聚集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艺人,自己是玩友班的鼓师,且技术一流,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亦属少有。陈兰亭本是袍哥大爷,占“义”字,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个袍哥集团。陈兰亭为满足嗜好,不惜重金邀请到多个戏班的“高人”,封其师部副官,以师部名义固定支付薪饷,薪饷等级视艺术水平高低而定,外界把这批人称为“玩友”副官。

陈兰亭玩友班上手琴师叫陈大毛,本名陈震权,广安县人,解放后在达县地区川剧团任琴师,1970年病逝。下手琴师龙春和,川南人,系陈大毛的徒弟,解放后在四川省川剧学校任老师。大锣先百川泸州人,大钹王少华江津人,二鼓郭明贵南充人,解放后先、王、郭3人在达县地区川剧团任演奏员。站场(小锣),一般临时找人填充。唱口有:马良玉,男旦,湖北人;曹锡山,须生,自贡人;马敦品,男旦,简阳人,解放后在达县地区川剧团工作;申玉松,须生,成都人,达县中学教师,不顾固定薪饷,由陈兰亭送他一些钱作为报酬。解放后,陈兰亭居重庆时,还经常到大梁子茶馆和玩友打围鼓。

研究社

清朝中、后期,达县城里没有固定的川剧演出班社,也无固定的川剧演出戏园子,但在每年农历正月过了,二月初二土地会前后,各地戏班应时而至,在南门外金华河滩搭露天台子演出,直到洪水季节到来为止。

民国元年(1912),广安县“全胜科社”在西赵家(赵国乡)演出,被达县城的绅士邀请进城,租郑家祠堂(永久粮库)建“绥乐茶园”演出川戏。次年,达县石桥乡王洞堂集资在郑家祠堂附近新建一座“绥乐茶园”,作为全胜班的正式固定演出场地,王洞堂遂成全胜班的老板,由此全胜班成为达县城第一家川剧班社。后来达县陆续出现的川剧班社有靖国军班、顾青山班、新华舞台、城隍庙戏院、长胜科社、达县川剧研究社、游民剧团。

达县川剧研究社是戏班名称,并非搞理论研究,是唱戏的班社团体。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达县城的玩友王少华、陈震权、先

巴渠河川剧

笑渐不闻声渐悄(重)



伯川、龙春和、邹明贵、覃正东、马良玉、高代中、李汉群、胡文志、赖子康、杨国成、周代忠等人,在正南街(今翠屏路)的德光茶馆里成立了“达县川剧研究社”,由达县参议长曾继武和袍哥大爷龙养泉为社长。戏班成立后,曾继武和龙养泉出面找周旅长夫人协商,把她的戏箱行头租借给研究社作为底箱。本是戏迷的周夫人慷慨支持,将留存多年的戏箱赠给了研究社。

1949年10月,重庆发生“九二”火灾后,达县川剧研究社在火神庙(西街金地阳光大厦即其旧地)为受灾居民募捐演出3天,演出剧目《阳河堂》、《南明关》、《桂英打雁》等。募捐演出门票由曾继武、龙养泉出面摊派给各机关、驻军、商人、商販。

川剧团

川剧团,是达州坊间对位于大西街原“达州市川剧团”的简称,该单位占地面积3037平方米,其中1221平方米的剧场可容观众1138人。2001年文艺体制改革,达州市川剧团、达州市歌舞团、达州市京剧团、达州市杂技团合并,组成“达州市艺术剧院”,至此“达州市川剧团”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称。一些爱好川剧的达州老人回忆,曾家喻户晓的“川剧团”成立于解放之初,该单位虽曾多次更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川剧团”。

通过聂绍红收集的《达县地区川剧团志》复印件,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3月,原达县川剧研究社、游民剧团部分成员及玩友共计40余人,组建成新的达县川剧研究社,它是经政府批准组建的县一级专业戏曲表演艺术团体,演出地点在火神庙,与当时的京剧团共用一座戏台,川剧白天演出,京剧夜晚演出。后来,随着开展基层文化宣传的需要,1951年达县川剧研究社改为达县川剧改进社,1953年改为达县川剧团,1958年改为达县专区川剧团,1964年改为达县专区农村川剧团,1969年改为达县地区川剧团革命委员会,1971年改为达县地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川剧队,1972年改为达县地区川剧团,1999年改为达州市川剧团。2001年,达州市川剧团被合并前的最后一场演出是折子戏专场,演出剧目有《穿鞋定情》、《失子惊疯》、《杀翟义》、《杀狗惊妻》。

在那个看戏比看电影更容易的年代,川剧团曾两次受邀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汇演。而如今,川剧家属楼上的大学标语“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川剧艺术”,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里曾有过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氛围。

创辉煌

1958年,川剧团响应时代号召上山下乡巡回演出,共计为基层工人农民演出835场,其中城市271场,农村564场。此后,戏曲舞台艺术受影视艺术迅速发展的冲击,川剧团演出逐年减少。时至2001年12月川剧团被合并前,当年演出仅有20场。然而,自1950年剧团成立至被合并的这51年期间,川剧团创作过多次辉煌。

1966年由张文志、罗立容、曾宪元、胡嘉芝等7人参加四川省赴京汇报演出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了川剧团创作剧目《管得宽》,受到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陆定一、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1983年,川剧团在成都公演《点状元》、《汉官怨》等剧目期间,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两次观看演出后,在与演员亲切交谈时见到舞台上的宿儒称,“简单,作风简朴,具有老根据地的特色”。事后,张老秘书送来题词:“蓉城放光,巴山辉煌;川剧艺术,精神粮食;品德高尚,大力发扬;勤劳简朴,世代流长”。

1986年4月21日,川剧团在京演出由宋小武编写,文先贵、朱家祥导演的剧目《史外英烈》,受到首都戏剧界专家、评论家的高度好评。4月24日,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和中国戏

剧文学会联合召开了有37位专家到场的座谈会。5月8日,《史外英烈》应中央办公厅邀请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汇演。《史外英烈》在京演出期间,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台分别录像和录音,《人民日报》、新华社、《戏剧电影报》等各大报刊发表新闻、评论、剧照。一时间,弘扬川剧成为戏曲界的重要话题之一,掀起了振兴民族传统戏曲文化的浪潮,川剧团也因此闻名遐迩,“围粉”无数。

重交流

川剧团从不固步自封,经常与全国各兄弟剧种、剧团互相进行艺术交流与学习,同时还通过辅导带动各县级剧团进步,从而使达州境内的巴渠河川剧艺术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为传承民族传统戏曲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0年,四川文化厅举办“全省川剧老艺人示范演出大会”,达县专区川剧团被省文化厅邀请参加示范演出的老艺人有廖盛奎、刘学智、陈震权,同时派往成都观看学习的有文先贵、张箭秀、王家达。同年,达县专区川剧团到陕西省安康地区、紫阳、镇巴县以及汉中地区、西乡县巡回演出时,每到一地就与当地剧团进行艺术交流、技艺切磋。当年,专区川剧团还先后派出名演员董船卿、梁成志、刘玉书、赖祥麟、彭少安,分别到开江、巴中、南江、平昌、通江的川剧团传授川剧技艺数月。

从1962年至1983年,川剧团曾选派文先贵、张文志等人去重庆参加“五专(五个专区)一市(重庆市)川剧青年演员进修班”学习;出胡永忠、蒲代吉、曾宪元等人到西安市向西安秦腔二团学习;徐金梅、周万秀、沈吉伟、付少康等人到北京,向正在京城演出的上海京剧院学习;冉瑞琼等人到广西桂林向广西京剧团学习;张文志、蒲代吉等到北京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学习;康仕金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化部“第四届戏曲演员讲习会”学习。在这不断自我提升的21年里,川剧团的演艺实力得到业界高度认可,吸引重庆市、贵阳市、解放军铁道兵第八师宣传队先后专程来学习和移植川剧剧目。

办艺校

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川剧团为让民族传统戏曲文化艺术得到更好传承,一直把培养接班艺人作为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参与新办培训班、艺术学校的方式,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充实达州各县川剧团,不断助推达州川剧艺术队伍的演出质量。

1958年4月中旬,达县专区召开的文化艺术跃进会上,各县要求达县专区开办川剧演员训练班。随后,达县专区发出同意开办“四川省达县专区川剧演员训练班”文件,并定于当年6月1日正式开学、启用公章,该“训练班”是解放后达州的第一个戏剧艺术专业教育机构。当年,川剧团团长马贵刚任“艺校”副主任,董船卿、彭少安、赖祥林等10多位演员任教师,55名学员全是各县川剧团选送的青年演员,经过为期半年的训练后,当中一些人后来在各剧团担任导演、主演。

据1986年达县地区文艺训练班印制的内部资料《达县地区艺术教育史略》记载,达州创办的戏剧艺术专业教育机构应时代需要曾多次更名,被坊间习惯简称为“艺校”,仅招录过8批学员,校址不固定,培训期限不统一,川剧团前后指派数十名演员任教。1988年,“四川省川剧学校达县班”是达州创办的戏剧艺术教育机构的最后一个名称,因达县地区与四川省川剧学校协商达成,以“省川剧学校”的名义挂牌招生,学制4年,31名学员毕业后以“省川剧学校”名义发毕业证,该校位于巴山体育场西三楼,就是现钟楼对面中心广场公交站位置。1992年,“艺校”全体学员毕业分配到达县地区川剧团工作。(未完待续)

川剧旦角罗少君